

# 《沉沦》阅读史与制造“文学青年”

金 理

**内容提要** 《沉沦》曾引发阅读热潮，促进了文学的代际更替以及新的阅读主体的产生。郁达夫在《沉沦》中创建了“文学青年”形象，且在生活中身体力行加以演绎与示范，而读者也将身份认同交由文学阅读来代理、筹划。《沉沦》开启的郁达夫接受与流行史，在阅读伦理、写与读的交互方式等方面，浮现出与众不同的特征，浪漫主义影响下的阅读教化也塑造出崭新的主体造型与身份认同。阅读是一种创造性的实践，在合力将一类新型青年形象与感性经验托举出历史地表之时，郁达夫与其读者之间有着复杂又有趣的互动合作。

**关键词** 《沉沦》；阅读史；文学青年

魏连受的客厅里经常“有些来客，大抵是读过《沉沦》的罢，时常自命为‘不幸的青年’或是‘零余者’，螃蟹一般懒散而骄傲地堆在大椅子上，一面唉声叹气，一面皱着眉头吸烟”<sup>[1]</sup>。鲁迅在《孤独者》中讽刺的这类人物在当时已成风气，且读着《沉沦》登上历史舞台，这提示我们从阅读史的角度探访“沉沦式的青年”<sup>[2]</sup>。阅读史注重阅读与生活、社会、权力的关系，进而有“文本中的读者”与“社会上的读者”之区分：前者指向传统以文学文本与形式为中心的研究方式，后者则聚焦“社会地、历史地和文化地构成”的“实际读者”<sup>[3]</sup>。本文侧重后者，不仅探讨作为文本被阐释的《沉沦》，更想考察作为一种行为模式的阅读活动及其社会效果。在阅读史视野中考察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互动情况，已经成为“重新探讨五四新文化运动历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学术生长点<sup>[4]</sup>。尤其《沉沦》与读者的互动生产出崭新的感性经验与身份认同，为青年形象的文学谱系增添了别样景观，本文在“五四”前后的思潮变动中考察“文学青年”造型的生成逻辑，也借此将文学的特质、效应置回到与社会、历史、文化等多重关联中予以把握。

标题中的“制造”受到史学著作影响，《制造路易十四》研究“树立路易十四而进行的宣传活动”<sup>[5]</sup>，强调媒介、形象与实际经历、集体需求间

的错综联动。《法国大革命的文化起源》关注“书籍制造革命”：“印刷文字催生的新思想，征服了人们的头脑，形塑了他们的存在方式。”<sup>[6]</sup>郁达夫总结“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首推“‘个人’的发见”<sup>[7]</sup>，人的改造工程通过文学这一媒介催生思想、征服头脑、形塑存在。郁达夫在《沉沦》中创建了“文学青年”的形象，且在生活中身体力行加以演绎与示范。而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也将身份认同交由文学来代理、筹划。一方面，小说召唤作为“阅读共同体”的“文学青年”；另一方面，阅读史的研究也触摸到“文学青年”生成背后的历史契机。需要注意的是，“制造”并不意味主/客、主动/被动的两立，艺术史家发现“在构成历史变化感的新主题之现身上”<sup>[8]</sup>，需要观众与画家并肩演出。阅读同样是创造性的实践，在合力将一类新型青年形象与感性经验托举出历史地表之时，郁达夫与他的读者之间有着复杂又有趣的互动合作。

## 一 阅读机制与阅读程式

《沉沦》畅销<sup>[9]</sup>，离不开作者的着力经营，所谓“《沉沦》争论”不乏自编自导痕迹<sup>[10]</sup>。不过仅凭营销有术不可能一纸风行，《沉沦》切中了或隐或显的时代主题。下文通过阅读机制与阅读程

式两方面呈现读者接受：前者外显，侧重“在哪读”“谁在读”，将阅读置入具体的历史脉络；后者内在，侧重“怎么读”，在文化背景、文学惯例及作者引导等条件制约下<sup>[11]</sup>，读者从《沉沦》中读取到了特定的镜中之像。

1923年10月，郁达夫赴北大担任统计学讲师，周围集结了陈翔鹤、陈炜谟、冯至、胡也频、沈从文、刘开渠等一批文学青年，交往密切，“谈晚了就横卧在达夫兄的床上过夜。谈话的范围，大都不离文艺”<sup>[12]</sup>，而《沉沦》则是其中必不可少的谈资<sup>[13]</sup>。20世纪20年代这个新兴的、与特定地理空间关联且具有归属感意味的阅读共同体，近年来已为学界所瞩目，藤井省三别称其为“四合院共同体”，在北京的四合院中，学生、文学青年以房间或院落为单位，轮流阅读作品并且交流读后感<sup>[14]</sup>。集体阅读《沉沦》也发生于上海的亭子间。1922年，许杰任教于安徽旅沪公学，读到郁达夫的《沉沦》之后，“就自以为很了解、很认识他似的，私心也就非常倾慕他”，许杰和同事王以任挤在一间亭子间里，“总是共同抢读郁达夫的作品。我们有时并头在读，有时又放下书本，议论、闲谈。我们各自，都自以为比别人更加懂得郁达夫，了解郁达夫。在我们的口头中，总是达夫这样、达夫那样的，好象他就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前面”<sup>[15]</sup>。

“阅读变革”是西方阅读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在《沉沦》的阅读史个案中，并无集体阅读与私人阅读的续替，二者不相矛盾地共时存在。上文凸显对于《沉沦》的集体阅读，其意义在于：首先，集体阅读是社会交往、营建身份认同的黏合剂。新一代青年读者打破传统地域、血缘联系，在集体阅读基础上形成崭新的共同体。学生公寓和亭子间正是《沉沦》阅读中形成的、典型的互动空间，为青年提供了发现、倾诉“生的苦闷”与“性的苦闷”的平台，引发思想感情的交流和共鸣，将分散的个人情愫汇集为集体诉求。其次，集体阅读的源头联系着宗教崇拜（如《圣经》阅读），“五四”新文化倡导启蒙、祛魅，然而阅读产生的冥想，一方面将新青年从传统社群中分离开来，另一方面也在制造权威，分享“达夫这样、达夫那样”的集体阅读，促使读者个体“万川映月”般建立起对文化偶像的推

崇。再次，阅读共同体不仅是经验的，也是想象的。个体的阅读也在意会着其他“匿名的”读者，一起参与历史进程。在新文学早期作品中，《沉沦》最具测震仪一般的个人敏感性，检测痛苦、起诉压迫，在一个个陌生读者感伤与眼泪的洪流中识别出千丝万缕的联系，由此私人文学阅读也开启了集体性、社会性的公共空间。

以上讨论依然泛泛，但提示我们将论题从“在哪读”推进到“谁在读”——《沉沦》召唤出了何种读者群体。“阅读会因空间和时间而有所差异，而研究者又想要使用文学重新建构文化，那么，研究者就需将特定的文本与产生和消费这类文本的群体联系在一起，并阐明参与其中的个体实际上是如何将这些文本建构为意蕴丰富的符号学结构。”<sup>[16]</sup>下文首先勾画《沉沦》读者群，其次呈现他们由《沉沦》所读取到的“符号学结构”。阅读会因时空、个体等差异而千差万别，但此处只考虑具有相同生活经历、身处特定社会位置、共享近似文化资本与阅读习惯的读者，他们作为《沉沦》的受众主力，形成一类同质性的阅读共同体，在阅读活动中建构起的“符号学结构”也大致相似。

“五四”之后，受新思潮感召，中小知识分子从家庭、宗族、地方等传统社群中解放出来，自由流动到城市，这些边缘知识青年正是新文学作品的实际读者群<sup>[17]</sup>。他们接受新式教育又谋生乏术，当汲汲于寻找个人实现、被社会有效吸纳的可能之际，“文学”凸显出来成为一大选项，“‘文学’在某种程度上已从思想革命、社会改造的有机整体中独立出来”，“依托社团、期刊、读者、批评，落实为一个特定的‘新文坛’”<sup>[18]</sup>，为边缘青年提供了自我安顿、社会参与的空间。新文化运动的代际划分，一般而言，第一代为《新青年》群体（“先生一代”），第二代为新潮社群体（“学生一代”），第三代则被姜涛描述为“文学青年”一代（下文在此特殊意义上使用“文学青年”时一律加引号）。彼时“文学青年”与“新文坛”的互塑，姜涛曾引茅盾的观察予以印证：1922年左右，“一个普遍的全国的文学的活动开始来到”，“青年的文学团体和小型的文艺定期刊蓬勃滋生”<sup>[19]</sup>。郁达夫等创造社元老并未直接参与《新青年》时代的文学革命运

动，年龄上与傅斯年、罗家伦等“五四”第二代相仿，然而“反倒是在新文学的第三代人那里，获得了更多的反响”<sup>[20]</sup>。从阅读市场的争夺而言，《沉沦》与前期创造社的成功之处，在于当读者更新换代之际，及时充当了以“文学青年”为代表的新一代读者的代言人。据当时读者印象，在文学场域内的竞逐中，“创造社拥有这样多青年欢迎的作者，所以他们声势凌驾同时的各种团体以上”<sup>[21]</sup>，而文学研究会则“因为受过‘创造社’的极力的攻击，在青年间曾一时失掉了信仰”<sup>[22]</sup>。新文化运动兴起时，“先生一代”大都已有固定职业、家庭和丰富的社会阅历；等到创造社横空出世，郁达夫们从留日学生到“异军突起”这一笔经历中挫折与狂喜的五味杂陈，特别引发青年读者共鸣。“当‘郁达夫式的悲哀’成为一个时髦的感觉后”，叶圣陶“以中等阶级的气度与身份”编织的梦“便成一个嘲笑的意义而存在，被年轻人所忘却了”<sup>[23]</sup>。以《沉沦》为代表的创造社前期作品，在启蒙式的文学格调之外，促进了文学的代际更替以及新的阅读主体的产生，“青年的知识分子不出于绝望逃避，便得反抗斗争。这两种倾向都是启蒙文学者所没有预想到的。创造社几个作家的作品和行动正适合这些青年的要求。创造社所以能够获得多数的拥护者也是这个原故”<sup>[24]</sup>。郁达夫正是“文学青年”一代的代言人与制造者。社会流动中的创伤经验、与周围环境的疏离感受，成为青年人文学意识的出口；而《沉沦》提供的一整套表达形式、身份认同及与世界的关联模式，不断催生出“文学青年”：

我读了《沉沦》之后，不觉陡然吃了一惊，自忖道：“呵，我怎样跑进这本书里做起主人翁来了呀？郁达夫，我和他并不相识，我底秘密，他何以调查得这样清楚，并且这样详细呢？”奇怪了一会，心上明白了：“呵，沉沦的青年原不止我一个人呀！同病相怜的尽多着呢。”<sup>[25]</sup>

每个读者从作者（郁达夫——引者注）这幅阴霾的自己写照里，发现自己的模样与作者的模样有种种境遇上的共通性，因而意识上的共通性，作者在这里，终于攫取了许多年青人的心脏了。<sup>[26]</sup>

《沉沦》对青年身心危机作充分描述，在同病相怜

的基础上建立“经验共同体”，而读者照见自我、寻求同类等心理需求也在阅读过程中得以满足。

“《沉沦》一出”，之所以“如决堤的洪水一样”“泛滥全国”，恰在于包揽“贴切一切年青人身肤的性爱问题，婚姻问题，教育问题，失业问题，乃至最根本的社会制度问题”<sup>[27]</sup>。《沉沦》既“巧于代辩一个时代的青年们所共有的”<sup>[28]</sup>生存困境，又策略性地对某一类型经验进行集中调取、标举与演绎。比如主人公受苦受难的形象正是为了投合阅读期待、型塑身份意识。在人类的集体意识中，受苦受难的疗愈师形象备受尊崇，基督是其原型之一。有意思的是，写于同期、收入同集的《南行》中的伊人，曾以福音书中“登山宝训”作演讲题目，“心贫者福矣，天国为其国也”<sup>[29]</sup>。《沉沦》主人公也仿佛受苦受难的基督在向“心贫”的读者传教。疗愈师神话的依据在于如下信念：“极度痛苦的孤立处境乃是赢得无比强大的在场状态与最为有效的亲近关系所必须付出的代价。”<sup>[30]</sup>疗愈犹如阅读：苦境中的人们期盼着从一个身处同样命运的人口中听到救赎，后者越是承受苦难就越是强化其神圣性而受到爱戴。同样，击打在《沉沦》主人公身上的苦难也转化成光彩夺目的威望。

时人在描述郁达夫的读者群时每常用到“青年界”<sup>[31]</sup>这个词，需要注意的是，“青年”作为社会“界别”已呈现新的代际划分，此处的“青年界”不同于新文化运动初期对胡适们顶礼膜拜的“新青年”。郁达夫捕捉到了阅读代际更替的症候，在创作中有意识的因应，且以此为据把脉阅读消费市场。他善于调动穷愁苦闷的经验来争取读者共情，“在贫民窟、破庙中去寻那些可怜的读者”<sup>[32]</sup>。生活中“可怜”的弱者移置于文学场域则为“无名作家”。《沉沦》出版前一个月，郁达夫在《创造》出版预告中扬言打破“新文艺为一二偶像所垄断”的局面，表示“愿与天下之无名作家共兴起”<sup>[33]</sup>。在20年代文坛上的“导师”与“青年”之争中，“相较胡适、刘半农等人对青年的‘棒喝’，郁达夫与青年处于‘同情者’的姿态”<sup>[34]</sup>，接济与提携“文学青年”更是不乏其例。夏蒂埃在研究法国大革命的文化起源时，发现1760年之后，大量“无资质作家”涌现，“他们所受的教育赋予了他们责

任地位，但机会的通道十分拥堵”，岗位与期求之间的紧张在文学界呈现尖锐对立：一方是启蒙哲人派的文学权贵，另一方则是“贫贱的卢梭们”<sup>[35]</sup>。20年代中国文坛的情形庶几近之，“无资质作家”对卢梭的爱戴，就仿佛“文学青年”对郁达夫的拥护。难怪郁达夫被视作“中国的卢骚”<sup>[36]</sup>。

## 二 “文学人设”与读、写共情

郁达夫以《沉沦》开启自叙传写作之旅。读者眼中，“没有亲身经历那样的事的人，倘若描写或是记述那件事，总不能写得惟妙惟肖，丝毫不爽”<sup>[37]</sup>，于是主人公等同于作家；二者叠印出来的穷愁青年，也正是读者的镜中之“我”，“从中依稀认出自己的面影”<sup>[38]</sup>，“他们都是《沉沦》中的主人公”<sup>[39]</sup>。郁达夫小说常被目为“抒情诗”<sup>[40]</sup>——一种在作者与读者间吁求直接交流的文体，“抒情诗在其情感的最高潮处常常会转向一个人的意识和另一个人的意识之间的直接交流，在那里，诗人的‘我’直接地向作为个体的读者的‘你’发出恳请”<sup>[41]</sup>。郁达夫基于内在感性的人格公开与“自白的坦白，仿佛给一切年青人一个好机会，这机会是用自己的文章，诉于读者，使读者有‘同志’那样感觉”<sup>[42]</sup>。当人物、作者与读者一一划上等号之后，文学内外的共情机制就此启动。

作者对文本解读方式的规定是阅读史的重要课题。郁达夫主张文学经验与人生经验的无间交融，也指引读者在阅读中以心求心。“‘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这一句话，是千真万真的”“作者的生活，应该和作者的艺术紧抱在一块”<sup>[43]</sup>；而具备永久价值的文学是一类只有“情绪的要素”的文学，即只描写抽象的情绪而不说明情绪产生的原因。欣赏这类文学要求读者与作者“处在同一状态之下，那么读者读了他的作品，就仿佛是和读了自己的作品一样，作者的悲哀，能变成实感，感染到读者的身上去”<sup>[44]</sup>。作家对读者的角色规定，不仅体现于序跋与文论等，也落实到小说文本内部。我们来看《沉沦》第一、二章的开头：

他近来觉得孤冷得可怜。

他的早熟的性情，竟把他挤到与世人绝不

相容的境地去，世人与他的中间介在的那一道屏障，愈筑愈高了。

天气一天一天的清凉起来，他的学校开学之后，已经快半个月了。那一天正是九月的二十二日。

他的忧郁症愈闹愈甚了。

他觉得学校里的教科书，真同嚼蜡一般，毫无半点生趣。天气晴朗的时候，他每捧了一本爱读的文学书，跑到人迹罕至的山腰水畔，去贪那孤寂的深味去。<sup>[45]</sup>

“他”叫什么名字？“学校”是哪一所？为什么是“那一天”而不是“有一天”？“九月的二十二日”在哪一年？“山腰水畔”又位于何方？身世与遭际是郁达夫小说最重要的接引媒介，此处却有如冰山巨大的底座并未浮出水面（这些信息延宕到第三章才交代），无论自居边缘的孤独还是不容于世人的羞辱，读者仿佛早和作者一样统统经历过，无需辞费，“达夫的遭遇，正是大多数青年一般的遭遇，达夫的悲哀，正也是大多数青年一般的悲哀”<sup>[46]</sup>。一般小说叙述假设读者什么都不知道，需要作者从宏观到具体、从广角全景到聚焦特写般娓娓道来，让读者一步步进入情节。而在《沉沦》开篇，读者与作者已莫逆于心，前者如果接受此种叙述手段赋予的角色，就会与小说人物融为一体，随同作者俯仰于故事的波澜起伏中。所谓“情绪的要素”的文学，似乎正是对《沉沦》的理论总结。

郁达夫通过《沉沦》有意识地导引、固化一种阅读程式，将身世、性情与内在主体性作为达成有效阅读的前提，在小说人物、作家与读者间吁求透明性，建立毫无间隔的认同感。郁达夫诚为“中国的卢骚”，“卢梭主义的冲击多半是卢梭自己造成的。他诉说他的读者最私密的经验，而且鼓励他们看透隐身在文本背后的那个卢梭”<sup>[47]</sup>。署名“元吉”的读者较早发表了《沉沦》读后感，他当是郁达夫心中的理想读者——“这本《沉沦》，无异是我往日生活的一张唯真唯肖的摄影，也无异是我今日的一篇赤裸裸的忏悔录。我自己敢自夸一句：我是能认识《沉沦》的。我没有辜负了作家底苦心。”<sup>[48]</sup>读者告白没有辜负“作家苦心”，以郁达夫部署的阅读

程式阅读《沉沦》，“向他保证那些讯息从他的灵魂穿透印刷的扉页传到了他们的灵魂”<sup>[49]</sup>。

当“共情”机制激活之后，人物、作者与读者间划上等号；但是，拨开阅读接受中的有意忽略，主人公与作者间的距离并非无迹可寻<sup>[50]</sup>。若将郁达夫留日期间作的旧体诗与《沉沦》一并视作自叙传，则二者呈现的自我形象大相径庭。前者多有对异族文化超越现实功利的融入与领受，且不乏神采飞扬的神情。这是极有意味的歧异：旧体诗依循文类的惯性，在传统暮光中延续文人酬唱交游的逸兴；而小说携带着现代性，必须与传统对抗、向现实危机敞开，进而呈现分裂、不稳定的自我主体。再据日本友人留下的回忆录，郁达夫留学期间与日人交往“毫不拘束”“期望极世俗的荣誉”<sup>[51]</sup>，恰与《沉沦》主人公形象形成反差，“那种从郁达夫行为作风联想出的、热爱世纪末文学的颓废派形象，仅就他所表现出来的天性来说，是看不到的”<sup>[52]</sup>。

《沉沦》“吹醒了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sup>[53]</sup>，主人公旋即被作为“我们谁都认识”的“现代的青年中的一个代表”<sup>[54]</sup>，作者被“青年引为知己”<sup>[55]</sup>与代言人。郁达夫在读者眼中必须是浪漫和颓废的，“外表的形象，一定是西装革履，衣服的口袋上露出半朵折花的手巾”<sup>[56]</sup>。我们不妨将其命名为“文学人设”——一种由读写两边合力打造、关于作者的特殊视觉形象。该形象建构起来之后会主宰人们的感受与认知，例如阅读期待反作用于作者/代言人，而郁达夫深知读者“要来‘瞻仰’我的‘丰采’”<sup>[57]</sup>的诉求，自觉依据读者与作者间签订的脚本进行“角色扮演”。1934年至1936年间的自传片段中，郁达夫自我塑造的形象，就是孤旅漂泊的零余者（批阅过此自传后的日本学者评价郁达夫“很有喜欢自我作践的特点”<sup>[58]</sup>）。《雪夜——自传之一章》写留日生活，完全可以视作《沉沦》的注脚。在大部分场合，为了匹配《沉沦》的自叙传形象，郁达夫对留日生活的回忆，基本论调是“在那荒淫残酷，军阀专权的岛国”“所经历的一切”“没有一点不是失望，没有一处不是忧伤”<sup>[59]</sup>。现实中的郁达夫需要认领文学人物的标签，公开出版的日记中连篇累牍地塑造多愁多病之身，也曾自嘲“惯于喊穷喊苦”<sup>[60]</sup>。甚至著作等身、“有了地位”之

后，“依旧遇人即诉穷”<sup>[61]</sup>，以致引来不解，“达夫的境遇，也不至这样苦，何以写得那样招人落泪的呢？”<sup>[62]</sup>偶有煞风景的“经验读者”从《日记九种》中拼凑出“郁先生三月来之饮食男女的一笔简略的账”后反问道：“可以看出社会待郁先生太薄？”<sup>[63]</sup>因沉湎于郁达夫的“文学人设”而在百闻不如一见后大呼上当的读者不在少数<sup>[64]</sup>。

### 三 浪漫主义影响下的阅读教化 与阅读代际的更迭

尽管与实际情况已有出入，郁达夫刻意同“文学青年”的形象、性情与生活状态保持共情与共相，通过阅读的召唤，溢出个人经验而影响波及公共领域，“在沈从文、王以仁、刘大杰、胡也频等一大批文学青年的自我书写中，我们不难辨认出这种‘郁达夫化’的个人印象的印刻”<sup>[65]</sup>。后辈回忆中，每常出现“围着坐了，听他讲诗”<sup>[66]</sup>的情形，极具象征意味：以郁达夫为圆心，通过《沉沦》等作品的阅读，影响力从身边的“文学青年”辐射到未曾谋面的读者群体——由阅读建构起的“想象的共同体”。恰如达恩顿指出卢梭阅读史开启了新型的读者与作者之间关系，甚至一种新型社会心态；《沉沦》开启的郁达夫接受与流行史，也在出版制度、阅读伦理、写与读的交互方式等方面，浮现出若干与众不同的特征。

首先，《沉沦》阅读史为现代中国塑造了一种鲜明的感性文化，作者与读者彼此确信可以通过文学作理想与情感的互动，这一互动越过纸页而遍及日常生活。比如引发“穿着上和行动上亟力模仿”<sup>[67]</sup>，据匡亚明回忆，“那时我还在苏州的一个师范学校里读书，对于他的热烈的同情与感佩，真像《少年维特之烦恼》出版后德国青年之‘维特热’一样，我也仿效着做了一套香港布的制服”<sup>[68]</sup>。当《沉沦》成为“全国青年人手一册的读物”<sup>[69]</sup>后，偶像崇拜式的文学名流体系开始显现雏形，“郁达夫迷”<sup>[70]</sup>们经常以“朝圣的心情”去拜见<sup>[71]</sup>。直到1936年2月，郁达夫抵闽，《福建民报》刊出行踪，结果“半日之内，不识之客，共来了三十九人之多”，自午后到夜半忙于接见，

“连洗脸洗澡的工夫都没有”<sup>[72]</sup>。同年同月，郁达夫收到中学生来信，信中诚恳表示拟将“奖金千元无条件地赠送”，郁以为“奇怪”<sup>[73]</sup>，但若以今日粉丝文化（打赏）视之亦属平常。而图像复制、印刷等技术进步也助长了文学名流体系的成型，报刊影像<sup>[74]</sup>中的郁达夫大抵“头发凌乱，人是那么的颓唐”<sup>[75]</sup>，《沉沦》造型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其次，读者大众对作家个性魅力的关注不逊于对其作品的关注，而郁达夫对自叙传、天赋与独创性的强调无疑强化了对前者的关注。恰如卢梭的读者“要知道他那良师益友灵魂中的每一桩秘密、过去生活上的每一个细节”<sup>[76]</sup>，卢梭的独特个性灌注于每一细部。而当读者自以为对作家的了解已经“力透纸背”般抵达后者的个性时，这种了解就稳如磐石，“我们各自，都自以为比别人更加懂得郁达夫”<sup>[77]</sup>。作家有意拆除真实身份与文学人物之间的藩篱，而读者愿意入乎其内，与虚构角色感同身受，认领、消费作家提供的主观性，读写之间形成亲密情感交换。交换围绕文本、个性、生活史等任何带有作家接触的印记而发生，郁达夫的行踪、逸闻甚至谣言动辄见诸报端<sup>[78]</sup>，而情感交换也携带着市场交换的潜力。杭江铁路局邀请郁达夫饱览沿线名胜，将游记收入旅行指南，可能正是看中上述潜力。读者的好奇心与出版方的销售策略，销蚀了文学明星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之间的界限。

再次，严肃意义上的文学权威与大众市场上的声名流行之间有不同以往的融合，文学名望不仅与作品本身相连，而且源自作者与读者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来看两则回忆——

我们安徽学生会的几个同学办了贩书部，推销新出版的进步书刊。一个阴雨天，我们正在工业专门学校的门前卖书，来了一位并不显眼的男子，三十来岁，胳膊上搭着雨衣，他要买《觉悟》合订本和郭沫若的《女神》，我们便乘机向他推荐《沉沦》，说这部小说如何如何好，是郁达夫先生的近作，劝他买一部。那人听了，微微一笑：“我就是郁达夫。”<sup>[79]</sup>

仍然在上次遇见他的那一带衰柳岸边，我从南河沿欧美同学会借了布莱克和彭斯的两部诗集，边低头前行边背诵着《天真之歌》和

《经验之歌》中的一些诗句，几乎又与一位迎面而来的行人相碰。我赶忙站住，抬头一望，不免有点发怔，想不到正是上次遇见的那位先生。“您是郁先生吗？我太冒失，差点又冲撞您了。”<sup>[80]</sup>

以上回忆都作于1980年代，兴许不免有“为文造势”的痕迹，但重要的不是回忆所及是否真实，而是回忆者情不自禁且不约而同地陷入一种偶像化与声名崇拜的氛围，这是明星效应渲染的后遗症。明星效应甚至引发冒名顶替，需要郁达夫本人登报说明<sup>[81]</sup>，可见作家的公共身份不完全由本人掌控，而是在与出版、阅读建立的交换过程中被构造。

最后，郁达夫对上述阅读风气与机制的转换有自觉把握，主动加入与大众市场的互动：他关注“上海的小报”对于自身“消息行动”的记载<sup>[82]</sup>；在创作盛年期自编刊行全集，“似乎是一回破天荒的举动”<sup>[83]</sup>；自传与日记的持续刊布，无疑是感应到读者对作家个人生活的强烈关注。尤其《日记九种》风靡一时，印行十数版，其“赤裸的供状”<sup>[84]</sup>风格仿佛《沉沦》升级版。《毁家诗纪》则自曝婚变，“外扬家丑”中掺杂“文学的想象力”<sup>[85]</sup>，客观上满足了读者的窥探欲，让人联想起拜伦（擅长自我表演的浪漫主义大诗人）也曾在与妻子分居后发表《诀别词》。在郁、王婚恋及《日记九种》刊布前后，郁达夫的照片、画像更是“出圈”涌现在流行画报上“以慰青年想望先生丰采”<sup>[86]</sup>。

总之，与卢梭一样，郁达夫发明了一种崭新的、“现代文学的姿态”<sup>[87]</sup>，提供了最具吸引力的“文学青年的套式”<sup>[88]</sup>。1926年郁达夫任教于广东大学时，与洪灵菲有师生之谊，洪灵菲爱读郁达夫小说，作品中有浓厚的郁氏风味。洪青年时代有过“少年心事付飘零”的颓废期，一次买醉后在船家女的花艇中醒来，大呼“沉沦”<sup>[89]</sup>。王以仁自称对郁达夫作品有“嗜痂之病”，笔下人物的呼告——“只须有一个女人能够真心真意的怜惜我，就叫我即时死在她的前面我也甘心”<sup>[90]</sup>——对“沉沦式的青年”亦步亦趋，1926年王以仁蹈海自尽。上述心态与情节不免让人怀疑生活对艺术的模仿。即便无法一一坐实，但“文学青年”们在生活中演绎现实版《沉沦》，估计不在少数。

本文所指的“浪漫”，并不仅止于《沉沦》的文学风格，更将其理解为美学主张所熏染的一种主体造型，郁达夫对苏曼殊的评价恰可移用至此：诗、画与小说之外，“他的浪漫气质，由这一种浪漫气质而来的行动风度，比他的一切都要好”<sup>[91]</sup>。艾利亚斯在研究旧制度时期法国宫廷的浪漫主义运动时，批评过往的研究者将浪漫描写为“无结构的情绪和思维方式”，“仿佛这些群体是独立于人群，飘浮在空中”；转而要求考掘浪漫主义“动力”的社会渊源<sup>[92]</sup>。本文正是借鉴这一思路，将文学的内外与周边相结合，考察一种奠基于内在感性的自我造型，如何对青年人产生召唤，进而形成一类社会身份的想象与认同。阅读社会学主张，“不存在一个唯一的和一致的、被一个时代的全社会所接受的审美对象：每个集体都倾向于产生它自己的、与它的社会文化利益和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的审美对象”<sup>[93]</sup>。正是在此意义上，《沉沦》召唤着“文学青年”，特定的阅读集体生产出特定的《沉沦》读法。时人指认《沉沦》读者时时常联系到“没落士大夫阶级的代辩者”<sup>[94]</sup>“知识阶级中间层男女青年”<sup>[95]</sup>，正好击中大背景。科举停废后读书人上升通道变易，新学制培养出有一定知识却无足够技能的青年学生，社会发展又无法提供相应谋生岗位，于是浪漫主义预设的主体形象——与他者、秩序和理性相对立的内在的自我——迎合了“文学青年”们与社会“脱序”后流动无依的身份想象。《沉沦》中怀抱华兹华斯诗集漫步田园、敏感而孤苦的主人公，正是郁达夫接受浪漫主义和日本大正时期文学风尚之后，移植出的青年造型（在伊藤虎丸看来，郁达夫笔下人物约略对应于大正时代“文学青年”<sup>[96]</sup>）。

然而当时代主题词由“浪漫”转为“革命”之际，郁达夫终于呈现落伍之相。反映到市场上，“一九三〇年以后，达夫的小说销路不及从前”<sup>[97]</sup>。这也提示了阅读代际的更迭。“文学青年”被新文化运动的时代变局动员出来后，又大多不容于体制，脱序的青年个体日渐感到对国家与社会的无能为力。这个时候，浪漫化的自我想象吸引力不再，需要融入到主义、集体和组织中来满足理想和现实的双重需要。新一代读者从“浪漫”进阶到“革命”，他们眼中的郁达夫则从现代青年的代表沦落

为“往昔士大夫阶级的一员”<sup>[98]</sup>，作为读者的“文学青年”被革命回收，这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中青年形象的流变研究”（19BZW09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1] 鲁迅：《孤独者》，《鲁迅全集》第2卷，第9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2] 旷新年：《重读郁达夫》，《无居随笔》，第76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3] 理查德·约翰生：《究竟什么是文化研究》，《文化研究读本》，陈永国译，第3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4] 张仲民：《新文化偶像的塑造：胡适及其受众》，《学术月刊》2020年第12期。

[5] 彼得·伯克：《制造路易十四》，郝名玮译，第7页，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

[6][35] 罗杰·夏蒂埃：《法国大革命的文化起源》，洪庆明译，第62页，第174—177页，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

[7] 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第5页，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

[8] 石守谦：《山鸣谷应：中国山水画和观众的历史》，第419页，上海书画出版社2019年版。

[9] 《沉沦》出版后一月之内连印三版，有人统计至1932年底销售数为25500册，参见《读书录》，《紫晶》第4卷第2期，1933年4月。

[10] 详参陈子善《研究〈沉沦〉的珍贵史料》，收入《沉醉春风——追寻郁达夫及其他》，中华书局2013年版；朱国华《两种审美现代性：以郁达夫与王尔德的两个文学事件为例》，《扬州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咸立强《中国出版家·赵南公》，第四章，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

[11] 关于“阅读程式”，参见乔纳森·卡勒《结构主义诗学》，盛宁译，第18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12] 陈翔鹤：《郁达夫回忆琐记》，《郁达夫研究资料》上，王自立、陈子善编，第108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3] 刘开渠：《忆郁达夫先生》，《回忆郁达夫》，陈子善、王自立编，第87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14] 藤井省三：《鲁迅〈故乡〉阅读史——现代中国的文学空间》，董炳月译，第19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 [15][56][77] 许杰:《郁达夫在记忆里》,《回忆郁达夫》,第154—155页,第155页,第155页。
- [16] 珍妮斯·A. 拉德威:《阅读浪漫小说》,胡淑陈译,第6页,译林出版社2020年版。
- [17] 罗志田:《文学革命的社会功能与社会反响》,《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第290—301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 [18][20] 姜涛:《公寓里的塔》,第12页,第1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 [19] 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第5页。
- [21] 史潭:《记创造社》,《创造社资料》下,饶鸿竞等编,第992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 [22] 韩侍桁:《写实主义文学的发生》,《文学评论集》,第69—70页,现代书局1934年版。
- [23] 沈从文:《论中国现代创作小说》,《沈从文批评文集》,刘洪涛编,第93—94页,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
- [24] 郑伯奇:《〈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第12页。
- [25][37][48] 元吉:《读了〈沉沦〉以后》,《民国日报·觉悟》1921年12月11日。
- [26][27][95] 秀子:《郁达夫思想和作品》,《郁达夫研究资料》下,第402页、第405页,第406页,第403页。
- [28][94] 黄得时:《郁达夫先生评传》,《郁达夫研究资料》下,第424页,第424页。
- [29] 郁达夫:《南行》,《郁达夫文集》第1卷,第93页,花城出版社1983年版。
- [30][87] 让·斯塔罗宾斯基:《透明与障碍》,汪炜译,第761页,第416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 [31] 韩侍桁:《〈迷羊〉》,《创化季刊》第1卷第1期,1933年3月1日;秀子:《郁达夫思想和作品》,《福建民报·小园林》1936年3月3日。以上俱收入《郁达夫研究资料》下,第375页、第401页。
- [32] 郁达夫:《〈茑萝集〉自序》,《郁达夫文集》第7卷,第153—154页。
- [33] 《纯文学季刊〈创造〉出版预告》,《时事新报》1921年9月29日。
- [34][65] 刘潇雨:《“共情”的生成及其限度》,《文艺理论与批评》2020年第4期。
- [36][57][67] 钟敬文:《忆达夫先生》,《回忆郁达夫》,第216页,第219页,第216页。
- [38] 赵园:《郁达夫“自我”写真的浪漫主义小说》,《十月》1981年第2期。
- [39] 冯乃超:《艺术与社会生活》,《文化批判》创刊号,1928年1月。
- [40] 刘海粟:《回忆诗人郁达夫》,《回忆郁达夫》,第110页;张国祯:《郁达夫和我国现代抒情小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1年第4期。
- [41] 哈罗德·布鲁姆:《饥饿的海:雪莱导论》,《批评、正典结构与预言》,吴琼译,第20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 [42] 甲辰:《郁达夫张资平及其影响》,《郁达夫研究资料》下,第359页。
- [43] 郁达夫:《五六年创作生活的回顾》,《郁达夫文集》第7卷,第180—181页。
- [44] 郁达夫:《介绍一个文学的公式》,《郁达夫文集》第5卷,第225页。
- [45] 郁达夫:《沉沦》,《郁达夫文集》第1卷,第16页、第21页。下文对《沉沦》的引用均依据此版本,不再注出。
- [46] 陈文钊:《达夫代表作》,《郁达夫研究资料》下,第367页。
- [47][49][76] 罗伯特·达恩顿:《读者对卢梭的反应:捏造浪漫情》,《屠猫狂欢》,吕健忠译,第274页,第286页,第278页,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
- [50] 李音:《郁达夫、忧郁症与现代情感教育》,《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5期。
- [51] 稻叶昭二:《郁达夫——他的青春和诗·附录》,《郁达夫传记两种》,小田岳夫、稻叶昭二著,李平等译,第261页、第278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 [52] 大东和重:《郁达夫的读书体验——以日本留学时代为中心》,宋新亚译,《汉语言文学研究》2020年第1期。
- [53][85] 郭沫若:《论郁达夫》,《回忆郁达夫》,第3页,第8页。
- [54] 西澧:《闲话》,《郁达夫研究资料》下,第318页。
- [55] 萧乾:《评〈出奔〉》,《郁达夫研究资料》下,第394页。
- [58] 小田岳夫:《郁达夫传》,《郁达夫传记两种》,第1页。
- [59] 郁达夫:《杆余独白》,《郁达夫文集》第7卷,第250页。郁达夫偶尔也会流露出异质经验,忆及“留学东洋时,

看到日本的下层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态度。他们讲礼仪，达人情”。见严北溟《与郁达夫的交往》，《众说郁达夫》，蒋增福编，第115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60] 郁达夫：《有目的的日记》，《郁达夫文集》第8卷，第119页。郁达夫“哭穷”背后的文化与心理根源，参见杨小露《郁达夫的贫穷自述与“哭穷”背后的文化动因》，《文学评论》2021年第4期。

[61] 彭基相：《郁达夫印象记》，《郁达夫论》，邹啸编，第164页，北新书局1933年版。

[62] 殷公武：《杂感：〈芑萝集〉的读后感》，《晨报副刊》1924年3月9日。类似指责还有若谷《从郁达夫说到咖啡店一女侍》，《申报》1928年8月12日；穷汉《郁达夫无病而呻》，《小日报》1929年10月21日。

[63] 孙梅僧：《郁达夫的末路》，《郁达夫论》，贺玉波编，第156页，光华书局1932年版。

[64] 黎烈文：《关于郁达夫》，《回忆郁达夫》，第305页。另见钟敬文《忆达夫先生》与王啸平《作家与战士》，俱收入《回忆郁达夫》。

[66] 黎锦明：《纪念一位抒情文学家》，《回忆郁达夫》，第101页。

[68] 匡亚明：《郁达夫印象记》，《郁达夫论》，邹啸编，第162页。

[69] 钱歌川：《回忆郁达夫》，《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3期。

[70] 唐弢：《记郁达夫》，《回忆郁达夫》，第338页。

[71] 丁玲：《鲁迅先生与我》，《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3期；楼适夷：《回忆郁达夫》，《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3期。

[72][73] 郁达夫：《闽游日记》，《郁达夫文集》第9卷，第266页，第273页。

[74] 《郁达夫先生近影》，《人间世》第16期，1934年11月20日；《郁达夫先生近影》，《宇宙风》第30期，1936年12月1日。

[75] 郑子瑜：《天仙访郁达夫记》，转引自郭文友《千秋饮恨：郁达夫年谱长编》，第145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78] 竹溪：《郁达夫的行踪》，《烟视报》1927年6月22日；白金：《郁达夫的书籍》，《晶晶报》1929年6月3日；复旦：《郁达夫岳家被抄》，《上海日报》1930年12月1日。

[79] 张友鸾：《郁达夫二三事》，《回忆郁达夫》，第40页。

[80] 孙席珍：《怀念郁达夫》，《回忆郁达夫》，第69页。

[81] 《郁达夫启事》，《创造》第1卷第4期，1923年2月1日；《郁达夫启事》，《北新》第4卷第9期，1930年5月1日。

[82] 郁达夫：《村居日记》，《郁达夫文集》第9卷，第37页。

[83] 郑伯奇：《〈寒灰集〉批评》，《郁达夫研究资料》下，第319页。

[84] 曾虚白：《日记九种》，《郁达夫论》，邹啸编，第103页。

[86] 道听：《郁达夫恋爱记》，《上海画报》1927年12月6日；《庭前鸚鵡空无语：郁达夫情人王映霞女士》，《天鹏画报》1927年11月27日；李尊庸：《文学家郁达夫及其爱人王女士在西湖畔度其甜蜜生活之光景》，《世界画报》1930年1月19日。

[88] 郇淑禧：《郁达夫中短篇小说的结构和意义》，《郁达夫研究资料》下，第726页。

[89] 陈贤茂：《洪灵菲传》，第62—65页，学林出版社1989年版。

[90] 王以仁：《孤雁·流浪》，《王以仁选集》，第38页、第77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91] 郁达夫：《杂评曼殊的作品》，《郁达夫文集》第5卷，第256页。

[92] 诺贝特·艾利亚斯：《宫廷社会》，林荣远译，第345—346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20年版。

[93] 彼埃尔·V. 齐马：《社会学批评概论》，吴岳添译，第253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96] 伊藤虎丸：《创造社和日本文学》，《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孙猛等译，第149—17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97] 孙百刚：《郁达夫与王映霞》，第52页，宏业书局1978年版。

[98] 贺玉波：《论郁达夫作品的转变》，《郁达夫论》，贺玉波编，第199页。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何吉贤